

# 沙俄政府的反犹政策与苏联政府对犹政策之比较

朱 雯 霞

**【内容提要】** 伴随着波兰被沙俄帝国的瓜分,波兰境内的大量犹太人开始成为沙俄的臣民,但沙俄政权带给他们的不是安宁的生活,而是持续不断的反犹浪潮。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曾经使俄罗斯犹太人的处境有所改善,但随后沙俄新政权(1881~1914年)又开始采取了反犹政策。无独有偶,1924~1939年的苏联政权也采取了类似的不利于犹太人的政策。本文就试图对这两个不同时期政权的对犹政策进行简要的比较分析,以寻求他们的异同及历史根源所在。

**【关键词】** 俄罗斯 苏联 排犹政策

**【作者简介】** 朱雯霞,1980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上海200020)

由于历史文化及俄罗斯国家自身的特定因素,反犹主义的幽灵长期以来一直在俄国上空游荡。1881~1914年的沙俄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采取了排犹主义的措施,然而1924~1939年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同样在一些领域采取了不利于犹太人的政策。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却采取相似做法,既有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因素,也带有政权本身的时代烙印。

## 一 1881~1914年沙俄政府的反犹政策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分别于1772年、1793年及1795年三次瓜分了波兰。此后大量客居波兰的犹太人开始隶属于沙俄帝国的管辖之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约有五六百万的犹太人在沙俄帝国内居住,占当时全世界犹太总人口的1/3。数量众多的犹太人在俄国境内却属

于少数民族,他们普遍受到歧视甚至迫害,而且在俄国还形成了官方反犹主义(official antisemitism)。

俄国反犹的历史比较久远。从18世纪末起,沙皇政府就一直对其境内的犹太人实施限制和迫害的政策。这种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实行“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制度”,即在一些远离沙俄国家中心的边远地区划出一定的区域,让犹太人集中居住,以此限制犹太人的活动;其二是推行民族同化政策,集中表现在宗教和文化方面。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进行农奴制度改革,并揭开了沙俄现代化的历史序幕。由于受到当时西欧平等、自由和博爱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亚历山大二世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俄国犹太人的状况。因此亚历山大二世时期被俄

Lionel Kochan: *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 OXFORD UNIVERSITY, 3<sup>rd</sup> edition, p. 1.

潘光、余建华、王健:《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罗斯犹太人称为“黄金时期(Golden Age)”。但随着 1881 年亚历山大二世被刺,俄国犹太人短暂的“黄金时期”就宣告结束,一股新的反犹太主义的恶浪再次扑面而来。

1881 年 3 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遭到革命党人刺杀身亡。由于有犹太人涉嫌其中,反犹太主义在俄国境内空前高涨。所有的非犹太俄国民众都参与了这场血腥的反犹运动,并且首开了集体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先河。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继承者亚历山大三世也在其顾问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斯策夫“消灭 1/3 犹太人,驱逐 1/3 犹太人和同化 1/3 犹太人”的疯狂计划的影响下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的反犹政策。在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俄国民众针对犹太人的集体大屠杀“波格鲁姆”在各个地区相继发生,如罗斯托夫、雅尔塔、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等城市。

1881~1914 年,沙俄政府实施的排犹反犹政策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社会文化两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方面,沙俄政府的反犹政策主要是对犹太人从事的职业进行再次的严格限制。经过 1861 年在沙俄政府主导之下的改革后,资本主义在俄国有了较大的发展。大批的工业化企业在俄国建立。然而这些新兴的工业企业大部分都远离犹太人居住的栅栏区。同时沙俄政府对犹太人在栅栏区以外的活动进行严格限制,使得犹太人很难在这些新兴行业中获得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沙俄政府还对犹太人传统的就业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对信贷行业从业资格条件制定苛刻的规定。由于犹太人一直受到政府的歧视和限制,许多行业,如政府公职、教授、军官,甚至农民都不对他们开放。因此犹太人所从事的职业就集中在俄罗斯人眼中所有的低贱行业之中,如贸易中间人、信用借贷人及小手工业者。据统计,在 1818 年就有 85% 的犹太人靠前述的三种典型的“犹太人职业”谋生。而在 1881 年之后,沙俄政府对犹太人传统职业之一的信贷业的从业者进行了具体规定,要求从业者必须是东正教徒,因此传统的信贷业也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20 世纪初的尼古拉二世继承了其父的反犹经济政策。由于二月革命对沙皇政权的巨大冲击,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正在快速地瓦解沙皇的专制主义的政权基础,因此,尼古拉二世采取了较之其

父更为严厉的限制犹太人就业的经济政策。典型“犹太人职业”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天然联系是更为严厉的反犹经济政策出台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社会文化方面,沙俄政府的排犹政策主要集中在民族与宗教文化教育两个层面。

第一,在民族方面,沙俄政府的反犹政策体现在限制、驱逐犹太人。1882 年,亚历山大三世的内政部长伊格纳切夫颁布的《五月法令》就是严格限制犹太人的民族政策。该法令更为严格地限制犹太人在栅栏区之外的居住权,禁止犹太人在栅栏区之外兴建新的居民点。这种限制政策一直持续到 1914 年。在严格限制犹太人的“区外活动”的同时,沙俄政府还在 1881~1914 年之间实行了残酷的驱逐政策。从 1881 年开始,沙皇下令大量拆除原有的犹太人栅栏区,并将原先居住在栅栏区内的犹太人驱逐到更为边远、生存条件更为恶劣的地区,甚至驱逐出境。这种大规模的驱逐和在政府默许下广泛的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相结合,使得大量的犹太人不堪忍受,纷纷向国外迁移。这股外迁势头一直持续了 30 年。在这 30 年间,离开俄国的犹太人将近 200 万。这次外迁运动导致了著名的第二次“阿利亚”。

第二,在宗教和文化教育方面,沙俄政府的排犹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强迫犹太人改宗和推行俄语一体化,以此来促使犹太人同化,而放弃犹太族属性。东正教不仅是沙俄境内最具影响的传统宗教,而且也是沙皇政权的基础。别林斯基就曾说过:“这个民族(俄罗斯)……坚定地支持上帝的教会,祖先的信念,毫不动摇地尽忠于正教的沙皇;它最得意的格言是‘我们的一切都属于上帝和沙皇’”由此可见,东正教对沙皇政权的影响非同一般。正是基于此,沙皇实施了积极维护东正教的政策,这种政策就包括强迫犹太人进行改宗

“波格鲁姆”( )在俄语中表示“达到毁灭程度的大屠杀”,参阅前引书《犹太民族复兴之路》,第 39 页。

参阅 Victor Zaslavsky and Robert J. Brym: *Soviet Jewish Emigration and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83, p. 9.

参阅徐新、凌继尧著《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40 页。

同上。

原指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居住生活的行动。现在主要指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现的犹太移民潮。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别林斯基:18~19 世纪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234 页。

的内容。在此期间,作为“异教徒”的犹太人有许多被强迫改宗,但是在限制与同化的反犹民族政策的共同作用之下,也有不少的犹太人属于自愿改宗。他们自愿改宗的主要原因是通过改宗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善其生存条件。但是由于犹太人对于犹太教的特殊的虔诚的信仰,这种自愿改宗往往趋向于表面化。

在文化教育方面,沙俄政府推行严格的俄语一体化政策。在犹太人的“黄金时期”,不少栅栏区内的犹太人学校开始以意第绪语(也译作以地绪语)来作为教学语言。同时大量的以意第绪语为写作语言的作品纷纷出版。但1881年沙皇政府开始推行俄语一体化政策,禁止犹太意第绪语刊物的出版,同时关闭了大量的犹太学校并强迫犹太人将孩子送入东正教会学校,学习东正教教义,从而在根源上改变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同化和语言同化相结合的反犹民族政策对犹太人的负面影响尤其深刻。正是这种多方位的反犹政策形成了俄罗斯所特有的国家反犹主义。

## 二 1924~1939年苏联政府的对犹政策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维埃政权发布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强调各民族的权利平等及民族自决的自由权。这个宣言曾为俄国犹太人带来黎明的曙光。然而俄国犹太人尚未从狂喜中平静下来,新的灾难又向他们袭来。在1924~1939年,在斯大林曾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再次实施了一系列不利于犹太人的政策。

1924~1939年期间,斯大林虽然是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受到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力量的严重威胁。托洛茨基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党人,同时他又是一名犹太人。而且当时党内有许多这样较早参加革命、具有相当的革命经验和政治资本的犹太党员,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这批以托洛茨基为首的犹太党员在联共(布)内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他们对斯大林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斯大林发动了一场反托季联盟的运动。由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犹太背景,这场党内斗争随后逐

渐演化成为针对苏联犹太人的运动。斯大林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不利于犹太人的政策。因此斯大林政府的排犹政策同沙俄政府时期的反犹政策相比具有更为明显的政治特征。

在政治方面,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的排犹主义表现得较为突出。其主要政策就是对犹太裔的联共(布)高级领导干部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尤其是那些与托季联盟相关联的以及主张保持民族自决权等民族平等权利的犹太干部。在大清洗运动期间,斯大林明确提出要“清洗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中的民族主义分子”,并说目前联共(布)中“百分之五十的党员是商人”。事实上,斯大林所指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商人”就是犹太人。因为客观上,联共(布)内的犹太人党员不但在人数上占一半以上,而且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都比较强,多主张民族自决和民族平等。同时,“商人”历来是犹太人的别名。在撤换加米涅夫时,斯大林公开表示在俄罗斯国家里“由一个犹太人领导人民委员会是不明智的”,同时在私下里对接替加米涅夫的俄罗斯人李可夫说:“我们将摆脱犹太人了”。这一时期苏联政府对犹政策的结果是大批的犹太人被肃反和清洗。1918年成立的苏共犹太局也于1930年被撤销。数据显示大批的犹太人受到关押和管制,而且数量逐年上升。1937~1939年期间,受关押和管制的犹太人的数量分别是11903人(1937年)、12953人(1938年)和19758人(1939年)。犹太人在客观上成了30年代苏联大清洗运动的最大牺牲品。大清洗运动也是1924~1939年期间苏联政府对犹政策中具有明显排犹倾向的标志事件。

在经济方面,斯大林政府在1924~1939年时期的对犹政策主要体现在对基于自由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的改造方面。随着苏维埃政权的逐渐稳定,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越来越不适应苏联社会的发展。有鉴于此,列宁在其执政后期就开始实施以恢复商品货币关系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种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新经济政策与前文所述的犹太

Aron J. Katsenelinboigen: "Soviet Union: Empire, Nation and System", Transaction Publishers London, 1990, p. 471.

参阅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5、76页。

传统职业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俄国犹太人在事实上成为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 他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斯大林认为这种新经济政策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不相符合, 因此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 苏联就开始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改造, 转而实施以计划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政策。1925 年, 联共(布)十四大通过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总路线, 1927 年, 联共(布)十五大确定了“依靠贫农, 巩固与中农联盟, 坚决反对富农”的阶级路线, 此后就开始了对城乡资本主义的进攻。从 1929 年开始, 苏联就开始大规模地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 强制剥夺富农财产, 消灭富农阶级。在对新经济政策进行变革的过程中, 自由买卖和中间商受到严厉打击, 大部分犹太人正属于这项政策的打击范围, 犹太人在客观上成为这项政策的一个牺牲品, 很多苏联犹太人的生活再次陷入了困境。

在社会文化方面, 苏联政府主要在民族事务和宗教文化两个领域实施了较为明显的不利于犹太人的政策。当然, 与苏联政府的经济政策相同, 在社会文化方面的不利于犹太人的政策也具有相当的客观性。

首先, 同化或者说是俄罗斯化是斯大林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在 1924~1939 年期间, 苏联的国力仍然相对较弱, 而且受到国际反苏联盟的遏制。因此国家迫切需要建立稳固的国家认同感以此团结民众, 增强国力。但是, 苏联作为多民族国家很难建立属于单一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因此, 俄罗斯民族的认同感就被错误地当成了苏联国家认同感的同义语。斯大林在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下, 开始推行俄罗斯化的少数民族政策。这项民族政策本身的特质及内容就决定了其中可能含有的不利于犹太人的倾向。这一政策的排犹内容包括强制推行俄语, 减少犹太人居住地区的以意第绪语为授课语言的犹太学校, 减少出版意第绪语刊物等。有资料显示, 在 20 世纪 30 年代, 大约有 1 000 个意第绪语犹太学校被停办, 在 1928~1935 年期间, 只有约 3 650 本意第绪语读物出版。同时, 由于犹太人不具有斯大林关于民族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共同的地域”, 因此他拒绝将犹太人视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当然, 苏联犹太人也就不可能享有苏联其他少数民族所享有的民族自治权。

其次, 在宗教方面, 苏联虽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但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 这项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苏联政府在不神论和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名义下, 对宗教信仰自由进行许多严格的限制。例如, 不得在公共场所公开宣扬教义, 不得公开布道等, 而对宗教活动场所(犹太教堂)的建立更是进行严格的审核。这对笃信犹太教的犹太人而言本身就具有限制和歧视的因素。

### 三 沙俄政府反犹政策与苏联政府对犹政策的差异

1881~1914 年沙俄政府的反犹政策与 1924~1939 年苏联政府的对犹政策的实施虽然都对俄苏境内的犹太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但细较之下, 它们在对整个犹太人世界的影响程度方面存有较大的差异。同时, 两个政府之间本质性的差别, 也必然造成具体的政策之间的差异。

沙俄政府的反犹政策直接导致了大规模的犹太外迁移民, 其中有 80% 移向了美国, 为后来强大的美国犹太社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另一部分移民则在“热爱圣山”等组织的带领下移向了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应许之地”。这部分移民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及锡安主义组织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沙俄政府的反犹政策还使得大量的犹太人被屠杀, 这也是沙俄反犹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

相对而言, 苏联的对犹政策对整个犹太人世界的影响要远远小于沙俄政府。虽然, 苏联政府针对犹太人的政治大清洗不仅对苏联境内的犹太人, 而且还对苏联的社会和政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只是局限在苏联国内, 对整个犹太人世界的影响较小, 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犹太外迁移民, 当然这与苏联政府对向外移民的严格限制也不无关联。

参阅 Lionel Kochan: *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 OXFORD UNIVERSITY, 3<sup>rd</sup> edition, pp. 21~22

参阅 Victor Zaslavsky and Robert J. Brym: *Soviet-Jewish Emigration and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83 p. 17.

参阅 Lionel Kochan: *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 OXFORD UNIVERSITY, 3<sup>rd</sup> edition, p. 134

此外,这两个异质政府的对犹政策的直接导因也有所不同。沙俄政府反犹太主义政策的直接导因中宗教因素是主因。传统的对犹太教及犹太人的偏见直接导致了沙俄政府的反犹太主义政策的出台。虽然从表面上看亚历山大二世的被刺才是1881年之后的沙俄反犹太政策的最直接的原因,但在被刺事件的背后则是传统的宗教偏见。沙皇作为东正教最直接和最高的代表,其本身历来被视为东正教的化身,而犹太人对其的刺杀的事件因而就含有浓烈的宗教色彩。因此1881~1914年沙俄政府的反犹太政策的直接导因是宗教因素。

苏联政府的不利于犹太人的对犹政策的主要诱因则是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斯大林是为了巩固其在苏共党内的领导地位,才发动反犹太共产党员的政治大清洗。而集体经济政策实施的主要考虑是发展社会主义集体计划经济,并不是以消灭和迫害犹太人为目的,只不过犹太人在客观上成为这一经济政策的主要打击对象。

虽然在这两个异质政府的对犹政策当中存在着上述的种种差别,但是沙俄政府与苏联政府的对犹政策的后果是相同的——对俄罗斯犹太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这种同质的政策结果在两个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政府中同时出现,必然有其历史共性。

#### 四 沙俄政府反犹政策与苏联政府对犹政策的历史共性

沙俄和苏联这两个异质政府的对犹政策的历史共性首先表现为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及基于此的民族同化问题。无论是沙俄帝国还是苏联,其国家的政治结构“一直属于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服务性国家(service state)的性质,而不是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的结构。”这种民族国家是兴起于19世纪欧洲的基于单一民族及民族认同感的国家。而沙俄帝国与苏联共同的多民族的现实,使其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民族国家。由于缺乏民族认同感,超民族的国家认同感缺失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沙俄的超民族的国家认同感一直源于东正教和对沙皇的个人崇拜,但自由资本主义式的改革使基于专制主义的个人崇拜及东正教的超民族的国家认同感日趋瓦解。因

此沙皇政府强制推行以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反犹太的民族同化政策,其目的就是要新建一种基于大俄罗斯的民族认同感,以此来替代日渐丧失的超民族国家认同感。

苏联同样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超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则源于共产主义理想。但由于受国家经济实力的制约,共产主义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人们对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开始动摇,对能否实现共产主义产生争论。这些都可以从联共(布)党内的争论中发现蛛丝马迹。对共产主义能否实现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动摇了苏联政府赖以维其政权的超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因此斯大林政权初期就开始逐渐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民族同化政策。其目的同样是为了建立一种大俄罗斯化的民族认同感。正是这种目的导致了具有排犹倾向的民族同化政策的实施。当然,这种民族同化政策并不完全针对犹太人,但在事态的发展过程中,犹太人却成了这种同化政策的最大受害者。究其原因,犹太人的特性决定了这种必然的结果。犹太人作为客居他国的“流民”,从中世纪开始就一直受到主体居民的歧视和政府的迫害。这种情况反而促使犹太民族更加团结。犹太人在客居国中一直聚集而居,这是始于意大利政府的“隔都”政策的结果。这种与主流民族相对隔离而又集体聚居的生活状态使犹太人的民族特性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同时,基于犹太教的精神文化联系更难使犹太人受到客居国主体民族文化的同化。正是这种难以同化的民族特性使沙俄与苏联政府的大俄罗斯民族同化政策难以对俄苏犹太人发生作用。

两个异质政府之间对犹政策的另一个历史共性是这两个政府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1881~1914年期间,俄国社会正在从专制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型。这种转型从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就已经开始,但是直到1914年世界大战的爆发,这种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社会转型都没有最终完成。1924~1939年的苏联政府也同样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1924年之前,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在苏联境内全面完成,资本主义因素仍然存在。在1939年之后苏联通过连续实施“五年计

Hosking(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转载自罗伯特·A·帕斯特:《世纪之旅:七大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162页。

划”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因此 1924~1939 年的苏联正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转型时期。然而社会转型和过渡的共性是否必然会引起反犹太主义的爆发呢? 回答是肯定的。

由于社会处于转型和过渡时期, 旧制度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 而新制度则尚未完全建立。在这种状态下, 社会中就会出现诸多的力量真空领域, 既不受旧制度的制约, 又不受新制度的管辖, 矛盾丛生, 尤其是弱势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较为尖锐。政府为缓和民众的情绪, 往往会采取转移民众的注意视线和加快转型等手段。历史上, 犹太人经常成为客居国政府转嫁矛盾的目标和工具。因为犹太人是外来少数民族, 而且是可怕的异教徒, 同时还经常从事扰乱社会的投机倒卖活动等等。凡犹太人的种种特性都是其沦为政府转移民众视线的工具的理由。1905 年日俄战争失败后, 沙俄政府为了转移大众的愤怒情绪, 将祸水引向了犹太人。同时在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 犹太人善于敛财的特性本身往往也会引发主体民众的排犹排外情绪。因为转型时期的社会往往动荡不安, 大众的生活质量会出现普遍的下滑。相对而言, 犹太人的生活在转型时期会有明显的好转。因为政府权力的暂时真空客观上会放松对犹太人的诸多限制。这种错位必然会引起主体民众的反犹情绪。这种

大众性的广泛的反犹倾向也就必然会导致政府的反犹政策。

苏联政府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种急需大量的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由于犹太人的教育程度普遍较高, 因此这类人才大多为犹太人。大规模启用犹太人就造成了社会民众强烈的排外情绪。这种情绪又为部分政府领导人所利用, 从而造成了苏联政府的不利于犹太人的政策的出台。

因此同属社会转型时期的两个不同时期的异质政府实施同质的对犹政策也就属于历史必然了。这种历史共性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中依然可以发现。俄罗斯联邦在苏联解体后开始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造。这个改革过程直至目前还在继续。因此当前的俄罗斯也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在转型初期, 犹太人的善于营生的特性使得大量的社会财富聚集到了俄国少数犹太金融寡头手中。这种现象再次催醒了俄罗斯社会的反犹太主义。当前盛行的俄罗斯光头党就是这种反犹太主义和纳粹种族主义的联合产物。在这之后, 反犹太主义的政策是否必然出台尚未可知。但是反犹太主义在俄罗斯, 甚至在整个欧洲的沉渣泛起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责任编辑 向祖文)

## “振兴东北经济与东北亚经贸合作” 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杂志与黑龙江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振兴东北经济与东北亚经贸合作”学术研讨会于 2004 年 7 月 21 日在哈尔滨市友谊宫隆重召开。黑龙江省副省长王利民、黑龙江大学校长衣俊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董晓阳出席了会议。来自全国高校、研究机构的 6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分别由黑龙江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赵传君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常玢教授主持。会议围绕东北经济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以及如何通过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带动东北经济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会代表认为, 东北三省在建国初期有大量的苏联援建工业项目,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东北三省的绝大部分经济发展指标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东北三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老工业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举步维艰, 下岗富余劳动力过多, 不良资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农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面对存在的困境, 与会代表提出, 老工业基地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但可以逐步恢复。首先, 要抓好绝对优势, 善于利用比较优势, 把东北经济振兴与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结合起来; 其次, 东北三省不能各自为政, 应统筹调整工业结构, 既有分工, 又有协作, 真正发挥各自的区位优势; 最后, 东北三省要转变观念, 改变以往重经营环境、轻法律环境, 重前期服务、轻后期服务的状况,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实现东北经济振兴和跨越式发展。

(梓 墨)